

曹氏協寒金匱發微合刊

曹氏^{伤寒}金匱^{发微}合刊

曹颖甫 著
顾瑞生 校点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曹氏^货金^发微合刊

曹颖甫 著

顾瑞生 校点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兵部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5 字数 196,000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199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00

ISBN 7-5323-0424-8/R·117

定价: 7.05 元

再版前言

这次重印曹师遗著《伤寒发微》、《金匱发微》，有三点需要略加说明：第一、原来的《伤寒发微》刊本没有圈点，曹师生前曾为其幼女若华圈点了一部，这次排印就全部照样加上了，使之和《金匱发微》的形式相一致。第二、这两部书在前次刊行之后，曹师曾对原来的文字略有小小的修改，在订正仲景原文之处，又逐条加以注明，还有几次对原来的注文作了补充，现在全部根据曹师的手笔付排，因此目前的版本有少数地方和以前的刊本不同。第三、以前这两部著作先后单独刊行，重复的汤方，一律依照仲景原书用正文大字，现在既把两书合刊，就没有再保留重复汤方的必要，但是为了保存原来的内容，同时对于汤方前后小有异同之处，便于互相参考，因此就用小字双行排在仲景原文之下，免得在正文中重复出现，这是我个人的主张。除了这三点之外，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

我是在曹师门下学习诗文，虽然在追随左右之时，曹师亦有时为之讲解医学，终以意不在此，未加留心，所以到今天还是一个门外汉。现在重刊曹师这两部遗著，虽则由我来负责，但是对于曹师这一方面的学问，实在不敢妄肆议论。不过曹师的主张精神，根据平昔知闻，颇有需要谈的，因此就从我的思想所及，写几句在前面。

曹师一生提倡经方，不论是教导门人，或者是临证处方，一以仲景为法，因此少数敬仰他的人，说他是经方的典型，而

很多反对他的人，都说他是背时好古，实际上曹师这样的主张，完全是为当时中医学术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并不是曹师有意喜欢固执派别的成见。那时候，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国主义者挟其科学上的成就，用其全力摧残我国的民族文化，以期达到他永远奴役中国之目的，在医学方面也毫无例外。仰承帝国主义者鼻息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媚外惟恐不及，更说不到对祖国医学的保护。至于当时的西医，一种是认为中医在学术上落后，不科学，主观的全部加以否定；另外一种是为争营业，尽力对中医排挤。当时医学界曾流行着“中医不亡，是无天理”一句话，可见中国医学被蹂躏的程度。在中医本身，当此千钧一发之时，不愿奋起图存，用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使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不致灭亡，相反的却故步自封，视中医的存亡，好像是与己漠不相关。临证处方，用药不出桑叶、菊花、防风、荆芥，剂量不出三分五分，轻病俨然能够着手回春，重病就束手无策。至于麻黄、附子那一类能够愈病的峻药，不但自己不会用，不敢用，还要以打击别人的方法来掩护自己的短处，说什么“古方不可以治今病”。这样片面的抱着一己的成见来对待学术，医学怎样能够进一步提高。即使没有外力的压迫，前途已经非常危险。根据这样的情况，所以曹师极力主张经方，想把中医从庸俗的敷衍的治疗风气中挽救出来，使得治医的人们，除了知道中医在轻描淡写的时方而外，还知道有一种大方重剂可以挽救沉痾，使中医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用有力的事实，来挽救灭亡的命运，这是曹师不得已而不顾一切坚决主张经方的苦心，不但在当时，就是直到今天，还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

就时方来说，曹师也不是一概的加以抹杀，在同门秦伯宋兄的序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从曹师和丁甘仁先生的关系

中更加可以充分的说明。丁甘仁先生是以时方擅长，可是他的运用时方，完全因人而施，用丁甘仁先生的话来说：“我之所以用轻剂者，彼固未有重病也。”事实确是如此，丁甘仁先生的病号，大都是养尊处优之人。有的是偶感风寒，稍觉不适；有的是闺中弱质，情感抑郁。这样的病人，藿香、桑叶，陈皮、豆蔻，便已足够奏效，曹师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一遇到危笃的病症，丁甘仁先生就又往往以大剂活人，曹师对他的用附子理中汤治血症，推崇其深明医理。可见丁甘仁先生的运用时方，是有他一定的根据的。至于曹师那里治疗的，一般都是劳动人民，不到病势危险，决不就医，所以所用的全是经方大剂。丁甘仁先生不反对曹师用经方，曹师也不反对丁甘仁先生用时方，两人在医学上结成最相知的友谊，可见曹师的反对时方，并不是反对适当的运用时方，而是反对只知时方不知经方的市侩，否则曹师就成为泥古而不通今的曹师，而不是以保卫中医为己任的曹师了。

解放以后，辩证唯物论的医学巴甫洛夫学说开始介绍到中国来，不但逐步澄清泛滥在中国西医中间的唯心论以及机械唯物论、二元论、生机论、活力论等等各式各样的唯心论，同时也为中医明确了一条研究的方向。过去中医所说的心为君主之官，以及营气、卫气、百脉经络等等，虽然有许多是抽象的东西，有许多祇是从经验上得到的推论，实际上已经接触到神经系统的作用。在治疗方法上，主要从整体出发，不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一情况，也和巴甫洛夫学说有机体内在和外在环境的统一的基本观点有其相通之点。曹师虽然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接触到巴甫洛夫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医学的方法，特别注意人身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从联系中进行治疗，不但阐发阳明谵语，一下而愈是明显的例子。其他如用半夏去

心下水气以止呕；遇当利小便之症，不用五苓而用麻黄发汗。这种例子，在书中是多得不可胜举。就是对太阳太阴六经病将愈，从某时至某时各条，历来注家，不是纠缠于阴阳，便是认为无稽，曹师也从天时的变化和病情相适应来解释。这许多独特的见解，不但辨证的注意于人体的全面，而且把内在的主体和外在的客观环境都结合起来。虽然这许多见解，都是从中医学原来学说的基础上立说，有待于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但是这样从整体看问题的方法，将是今后医学界研究中医时一个很大的启发，也是引导医学界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在中国医学研究上的一个开端，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曹师的治学方法，我认为是并不夸大的。

书中曹师曾提到给他媳妇的妹妹治病的故事，那时她住在医院里，其家人贮药茶桃，伪言开水，携入医院，当时中医处境的悲惨，即此可以概见。今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掌握了政权，祖国的医学得以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不但在医院里中西医一起会诊，而且西医也须要学习中医，和中医一起研究祖国医学，中医在各方面的治验，亦逐渐为医学界所承认，这说明了无论任何学术，只有在人民的政权下，才能得到正确的发展。但是这一革命胜利的到来，距离曹师遇难已经十几年了，曹师当年为中医生存进行斗争的心愿，虽然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从作为一个门弟子的心情来说，墓门宿草，饱历风霜，春梦迷离，师门永隔，展读遗文，诚不胜羹墙之痛。

为了本书的再版，原来《金匱发微》的发行人同门钱颂霞兄特地从无锡到上海来进行联系，秦伯未兄在百忙中写了一篇序文，章次公兄始终关心此事，在去北京的前夕，特此赶到千顷堂书局询问情况，到北京后还不断来信，这都是出于曹师

门弟子关心曹师著述的高度热情,应该在这里提到的。

黄汉栋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秦伯未序

在我从丁师甘仁临诊实习之前，先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念书（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那时候，曹师拙巢以词章家兼通岐黄术担任讲席，为了我爱好文学，便跟曹师论医，余事学诗。毕业后还是和同学许半龙、严苍山、章次公兄等常到曹师寓所虚心地学习和反复问难。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在这过程中给予我深刻的印象，保留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曹师是经方派的典型，处方用药，都依照着《伤寒论》和《金匱要略》的规律，强调仲景后的方书卑不足道。我的看法呢？仲景辨证求因，分经定方，规矩谨严，在临床上自有一定的价值。但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范围不免狭隘，不同意把后代许多经验良方无形放弃。为了这不同的意见，我们有时引起辩论，在辩论时，曹师看到我们不能了解他的用意，往往舍医谈诗，拈题分韵，各自沉思觅句，把紧张的情绪很自然地缓和下来。我记得一九二四年的冬天，讨论芍药的酸敛和苦泄问题，沽酒烹茶，一灯相对，不知不觉的鸡声唱晓，最后还画了一幅墨梅送我，题句中有“微雪消时说与君”，便指此事，可谓风趣极了。其实，曹师明知同门尝用经方，而且也很愿我们从经方去旁求时方，得到更丰富的知识；相对地，曹师也常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和逍遥丸，以及牛蒡、前胡一类仲景书中不见的药，根本没有抹煞时方。次公曾对我这样说：“曹师善用麻黄、桂枝，深恶痛绝的是桑叶、菊花，所以经方和时方的争执，在曹师心目中就只麻、桂和桑、菊的区分。曹师也认识辛

温解表不适用于某些症状，所以他看到黄坤载用紫背浮萍，就把浮萍当做温病发汗的主药。”次公的体会，显然比我深入，曹师并非泥古不化，也在次公的语意中可以体会得到了。

一般熟悉，经方是一切方剂的基本，后世方剂大部分跟经方发展起来。譬如一株树罢，有了根才有枝叶花果，我们不能孤单的欣赏一枝一叶一花一果，而忽略了它的根子；同时，我们也不能见到一树一木，就认做是一座森林。曹师的极端主张研究经方而不坚持反对时方，便是这个道理。他充分地指出了研究中医应该从源寻流，不应当舍本逐末，给予后学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曹师的论诗推崇王渔洋，教导我们又鼓励多读汉魏乐府，曾经特地写了一本《古乐府评注》，可说是同一意义的。

曹师具有渊博的学问，可是业务并不太好，甚至异常清淡。那时，我的先伯父乡谥恭惠先生主持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每年端午至中秋节例有施医给药，就诊的都是劳动人民。丁师就委托我推荐曹师参加这治疗工作，大约前后有三年，《金匱发微》的内容，便是此时的治案（少数是另外的）。《金匱发微》仅仅曹师著述之一，最可宝贵的，不同于过去注家的寻章摘句，钻到牛角尖里；也不牵强附会，自作聪明。他把亲身实验到的老实实在地写出，没有经验的宁缺毋滥，绝对不妄加批判。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是曹师平生治学的特点，也就是《金匱发微》的实质。据我所知，曹师举孝廉时的房师是嘉定秦芍舛先生，也明医理；后入南菁书院肄业，山长黄以周先生是著名的汉学大师兼精医学。那末，曹师的医学知识，师承有自，可以概见了。因此，曹师在实事求是的诊断下，有“覆杯而愈”的，也有“一剂知，二剂已”的，声誉渐著，很快地转变了一部分同道轻描淡写的作风，不可否认是曹

师推动的力量。

日寇侵略江南，曹师的故乡——江阴沦陷，师激于爱国义愤，不屈殉难。在明年才得到消息，我曾撰诗追悼之（一九三八年）。在《伤寒发微》、《金匱发微》再版的今天，更使我回想到曹师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正确的教学方针。他留给我们的著作，正是发掘、整理祖国医学的宝贵材料。当然，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需要全盘接受祖国民族文化遗产，我们要从经方到时方，汤方到单方，取长补短，消灭宗派主义，发挥中医药更大的效用。然而这本册子，从中医临床来说，定然是值得重视的。

末了，我要说的，过去“仲景学医于同郡张伯祖，时人以为识用精微过其师。”但是我在中医方面，除了业务之外，虽然也做了一些事，自己觉得没有很好地继承衣钵，而且仍有不同的意见经常会暴露出来，对于曹师的表扬更是谈不到了。偶然和次公谈及，他也认为有同样的感慨，这是我们非常惭愧的。

秦伯未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写于上海市立第十一人民医院

曹颖甫先生传

我苏之江阴，昔有南菁讲舍，大江南北高材之士，多肄业其中，或深通经术，或擅长词章；其为人，或笃厚淳谨，或风流放诞。己未年，余与颖甫先后入南菁，而余以狂名，颖甫以慧名，人皆呼为“曹慧”，颖甫曰：“善”，亦辄自称“曹慧”焉。余之初遇颖甫也，彼此眼高于顶，覩面不语。既而在宜兴储南强斋舍中不期而相值。南强温文倜傥，同学中皆乐就之，与余尤称莫逆。南强指之曰：“此曹颖甫，诗文大家也。”余曰：“即曹慧耶？”颖甫辄应曰：“是也。”余斯时因养病习七弦琴，略知数引。颖甫闻琴大喜，每日至余处静听之。尝云：“曹慧向不肯下人，今于君乃心折矣。”颖甫于研求经训之外，肆力于诗文；其为文，初学桐城，更上溯震川庐陵以达晋魏。其诗尤超绝有奇气，不为古人所囿，别树一帜。壬寅登贤书，科举废，即绝意进取，征选知县不应。常借诗文以抒胸臆，而其傲岸之气，又旁溢为画梅。画拟冬心，而老干挺立，折枝洒落，含遒劲于秀逸，毕生风骨，盖寓于是焉。颖甫之画梅，必系以诗，诗主而梅客，虽以二者并传，君意则以诗名梅也。余于癸卯离南菁赴沪上，即与颖甫问隔绝，但闻辛亥革命时，颖甫以巾裹发，不肯去辫，乡人有谋用利剪剪之，则乘夜遁至沪上，久之方归。袁世凯称帝时，各县士绅列名劝进，某太史受袁氏金，为江阴县代表。颖甫于某，论亲则姻叔，论谊则业师，闻之，突诣某所，诘之曰：“叔竟受袁氏之贿，而作此无耻之事耶，我江阴人之颜面，为汝剥尽矣！”某大惊，急曰：“无此事，无此事。”一九二七年以后，余息影沪滨，则颖甫已悬壶市南，而诤迹于韩康矣。盖

颖甫之治学也，不深造则不休，中年肆力于医，乡人亦莫知之。及其应世，凡他医所谓不治之症，颖甫辄着手愈之。且于富者有时不肯医，于贫者则不取酬，且资其药。颖甫之同门友庄翔声有妾，患盲肠炎。颖甫居沪之南，庄居沪之北，路远不便，颖甫则自雇汽车，载其妾以归，为之朝夕诊视。病已十去八九，而患者有嗜好，讳而不言，致未固其元气，病遂革。家人谋归之，颖甫止之曰：“不可”，卒歿于其家。殓既毕，颖甫亲登庄君之门，叩首谢罪。其义侠之行类如此。孟河丁氏世业医，创医校于海上，延颖甫主讲座。虑其高傲不可屈也，颖甫乃夷然就之。其授课也，携水烟筒，纸煤一把，且吸且讲。以《伤寒》、《金匱》深文奥义，抉择隐微，启迪后进，学者亲炙其绪余，咸心悦诚服，而忘其举动之离奇矣。颖甫年七十，曾开筵祝寿，与余过从之密，如在南菁时。八一三变作，即返里，久无音耗。数月之后，其婿来沪，则言颖甫已骂贼死矣。先是，江阴城破，有敌酋入其室，颖甫尚与之笔谈，未有他变。及敌兵蜂拥而至，辱及妇女，颖甫则肆口大骂不止，敌举枪毙之，且剖其腹。呜呼！烈矣！余欲为文传之，以未悉其事状，久而未就。今始得其崖略，故著于斯篇。颖甫姓曹，讳家达，一字尹孚，号鹏南，晚署拙巢。江阴人。著有《古文》、《骈文》、《气听斋诗集》、《词集》、《梅花集》、《伤寒发微》、《金匱发微》。后三种已梓行。

蒋维乔曰：吾乡常州旧属有八县，而江阴居一，人民夙以气节称。明末阎应元戴发效忠，率民兵数万，抗清兵十数万，八十余日，城破皆死，无一降者。故江阴号称忠义之邦。颖甫之戴发效忠，与阎公趋向不同，而其忠义殉节，则后先一揆。彼身居乱世，遇威胁利诱，而中心漫无所主者，闻颖甫之风，可以稍愧矣。

蒋维乔

丁 仲 英 序

江阴曹颖甫先生，余先严甘仁公之道义交也。精邃国学，诗名尤著，以逊清光绪之季登贤书，尝以选班赴山左，无所合，困而归。爰整岐黄之术以拯生民，有所感慨，则托之于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之词。故大江南北，莫不知有曹诗人，而不知先生之又工于医也。先生之于学，上自经史，下至诸子百家，均有精深之研究。至仲景之学，则尤别具心得。尝谓其门弟子曰：“医虽小道，生死之所出入，苟不悉心研究，焉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今之所谓宗仲景者，名而已矣，实则因陋就简，胆识不足以知病，毅力不足以处方。真能宗仲景之说，用仲景之方者，曾几人哉？且仲景原书，经王叔和收拾于荒残散乱之余，字句不无缺失，任意增补，已不能吻合原著；加以数千年来传写之讹谬，笺注者非惟不敢置议，抑且于不可解者而强解之。甚至救表之当用麻黄者，不能正桂枝之失；汗家重发汗至于液虚生燥，当下以大承气者，不能正禹余粮丸之失，去仲景著书本旨，盖益远矣！今岁春，先生所著《伤寒发微》将以付梓，余信先生之书经艰苦卓绝而后成，为历来注《伤寒》史上可放一异彩，而永传勿替。是为序。

辛未孟夏 元彦 丁仲英 识

沈石顽序

仲师原序，自述作《伤寒杂病论》之经过，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丸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云云。书经五胡十六国之乱，已不无散佚。复经王叔和之编次，林亿等之校刻，改窜损益，参以己意，至成无己注《伤寒论》时，已久非最初之完书矣。且历代之注《伤寒》者，不下百数十家，大率皆妄易次序，颠倒经义，攻讦聚讼，支离破碎，蒙蒙昧昧，莫宗一是，致后学者徬徨歧途，无所适从。吾师拙巢夫子，为逊清大儒，文声医誉，传闻海内。念仲师作《伤寒杂病论》之本旨，原为教民治病用药之道，有所标准，不意传至今日，真义晦塞沉沦，惜效方之反足以杀人，使排斥仲景学说者，得乘隙而横行一世。故忿然而起，行道三十余年，研究经验之心得，注释《伤寒》、《金匱》，垂示后来，一洗空泛之浮论，专务实学，考据精详，凡无字之处，必反复探讨，一再解说。而仲景之不出方治者，综核尤为周密，此岂常人所能望其项背者哉。历三年，书终脱稿，意欲付梓，商诸章君次公，次公无以应，延及年许。今春乃由丁君济华，慨然助之，遂得杀青。印至二卷，适值丁君嘉礼之期，后二卷乃由石顽校订完成。仲师之学，医家之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离，所以师表万世。而吾师此书，以经解经，独得仲师之

奥,更足以光大仲师之学,其功岂小也哉。刊印将成,爰谨志
頌末,以志景行。

辛未端阳 门下士 石顽沈 松年拜序

自序

拙巢子少治举业，常以文学谭医理，空明研悟，自谓今古无双者，殆不减乎玉楸。夫人之一身，水寒而血热，液清而气浊。然阳谷温泉，严冬无冰，萧邪寒焰，盛夏不热，阴阳相抱，内藏乃和，长夏土湿，潦水不澄，秋高气寒，白露始下，升降轻重，损益悬殊。固尝踌躇满志，以为足治仲景书矣。不意开卷以来，辄生艰阻，九折之肱中截，十仞之渊无梁，则又为之傍徨瞻顾，慨焉兴叹。故不为之开山凿石，则夷庚不通；不为之伐木成桥，则彼岸不达。昔张隐庵集注既成，自序云：“经寒暑，历岁月，废寝食，绝交游，谅哉斯言。”予研核《伤寒论》，起于丁卯之秋，每当不可解说之处，往往沉冥终日，死灰不响，槁木无春。灵机乍发，乃觉天光迸露，春红结繁，夏绿垂阴。又如幽兰始芳，野水凝碧，神怡心旷，难以言喻。匝月之中，屡蹶屡兴，不可数计。书于庚午季夏告成，盖三年于兹矣。嗟乎！神禹畏龙门之峻，则北条洪河不奠；鬻熊惮革路之劳，则南荒山林不启。仲景之学，湮晦者几何年矣！自张隐庵出，始能辨传写倒误，而尚多沿袭。自黄坤载出，始能言三阴生死，而徇于五行。然则予之为此，正欲继两家心苦，以复旧观云尔。若徒以改窜经文为罪责，则是惜山泽而不焚，纵其龙蛇禽兽，惮荆棘而不剪，养其狐狸豺狼。此真庄生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者也。世有达人，予将拭目俟之。

辛未端阳后三日 江阴 曹家达